

当代视野

[文学史视野]

传统重建为何尴尬

——以“寻根文学”为例

朱水涌 张静

发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学一个极富启示意义的文学现象。寻根文学的发生和实绩,其实涉及到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两个主题,一是民族—国家主体形象的想象重建问题,一是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向往中对艺术创新的追求。在第一个主题上,寻根文学是与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紧密相系在一起的,它滥觞于科技界因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而引发的“科学传统与文化”的讨论,这体现出一种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身份意识。当然这种意识在当时是极其朦胧的,决不像今天这么自觉。但长期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看到的只是现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道路,却看不到现代化的中国的文化身份。80年代的“文化热”可以看做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最初对现代化中国的文化身份的思考,具体体现在寻根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中,就是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寻找传统文化的价值支撑。在这个主题上,寻根文学不仅延续了80年代初文学对“文革”扭曲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主体形象的反拨,而且将反思的历史时空推进到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姿态,有意把文学的反思从政治历史引入更深的文化“根性”,表现出一种重建传统的激情与焦虑。在第二个主题上,寻根文学则是呼应了拉美的“爆炸后文学”,一方面继续了中国新时期小说的艺术探索,一方面连续了后来的中国先锋文学的叙事追求,表现出中国文学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束缚后,寻求审美意识和叙事方式新变的努力。

然而,寻根文学最大的收获则在于将思想、传统文化的激情转换为审美空间的开拓,实现了当代文学想象范式的转折。它的意义在于“寻回被历史边缘化了的小说美学传统,即重视从个人意识、感受和趣味出发想象世界的传统,而不是在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掘和想象性重构方面取得了什么了不得的进展”。⁽¹⁾

那么,为什么寻根文学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掘和想象性重构方面没有取得什么了不得的进展,而且其创作实绩还与理论上的传统重建产生了一种悖离,最终不仅没能为中国当代文学寻到传统的价值依据,而且不知不觉地陷入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题之中?

—

文学“寻根”的提出发生在1985年,在此之前,阿城的《棋王》、郑义的《老井》、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大王庄》、《小鲍庄》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小说相继出现,人们注意到这些小说与原先“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叙事所不同的创作姿态和叙事方式,于是一批以这批小说为蓝本、力图以中国文化之“根”与世界对话的文学评论和作家创作谈在《文艺报》、《作家》等报刊上发表。这批文章提出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

化的土壤上”；⁽²⁾要“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³⁾开掘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塑造“民族自我”；“寻根”倡导者甚至认为：“五四”是传统文化的“断裂”，一代作家必须弥补这个断裂所带来的“民族文化修养的欠缺”，“跨越文化的断裂带”；⁽⁴⁾这表现出与80年代初期不同的创作意向。80年代初期，文学与思想解放合流，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和小生产意识成为文学的主题，这不仅为改革开放的现代道路清除思想意识的障碍，而且也将文学拉回到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人的文学”的轨道上。人们在描述这段文学图景时总称其为“五四文学的回归”；“人的文学的复兴”和“新启蒙文学”，并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钱谷融的《文学是学》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作为文学史图景的叙述线索。然而，“人的文学”并没能指向自己理想的想象，1984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笔下的“少男少女”们的出现，一面表现出文学迎着现代西方游荡而去的倾向，一面则给了新启蒙文学的文化指向、理性精神和崇高情操一个预兆性的打击。而打开了国门的中国，此时正面对着应接不暇的横向涌入的各种西方思想文化思潮，日渐清晰的全球化发展态势将文化的全球综合趋势与地域性寻根意识的冲突推向历史的前台，西方文化在“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裹挟下迅速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价值选择，用寻根作家韩少功的话说是“从外汇券到外国香水，都在某些人那里成了时髦”。在此背景下，80年代中期的文学一面对转型中“人的文学”启蒙前景的焦虑，一面对民族自我在共时横向文化交往中主体缺失的担忧，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学以一个怎么样的“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去达到“世界文学先进水平”的冲动；⁽⁵⁾文学的“寻根”由此提出，文学的“重铸”民族自我由此得到热烈呼应。无论是韩少功的挖掘历史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郑万隆“开凿”黑龙江的生命之根，还是阿城强调东方独特的文化限制，郑义将孔孟之道作为“民族文化最丰富的积淀之一”，都表现出文学回望传统、走出惯常的反传统的现代性框架的脚步，企望着中国文化的“涅槃再生”。这种为中国文学乃至民族自我寻找现代性资源和价值支撑的努力，实际上是当代中国文学现代性文化身份意识的体现，一种重建文学文化传统的体现。

遗憾的是，寻根文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最终并

没能寻到文化之根的支点，其创作也未能超越以现代性为主导的启蒙文学的想象，寻根之旅寻到的往往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失落，大难不死的丙崽天生弱智，顽固着非此即彼的惯性思维（《爸爸爸爸》），舍生取义的劳渣与生俱来仁义，这仁义则出现断裂与危机（《小鲍庄》），痛苦挣扎的孙旺泉有着压抑个性欲望的隐忍，为了成全祖祖辈辈夙愿，则违背科学地要在石灰岩区掘出一口出水的井（《老井》），固执的福奎老爹虽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却不得不遥望对面灯红酒绿感叹生命的无奈（《最后一个渔老儿》），在寻根作家这些寓言式的叙述中，预示的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溃败。除了惋惜，寻根作家并没能给传统文化的衰败和失落以合理的阐释，他们的笔下，传统文化只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现代性的某些欠缺，却无力照出这欠缺背后的真实，不少作品又不知不觉地落入了启蒙文学的“揭示国民性”的反传统圈套。至80年代末，这股创作思潮便日渐衰退，创作陷入困境，文学的重建传统陷入事与愿违、理论与创作分离的尴尬境地。

很多批评者在分析寻根文学的困境时，都说这是一代作家文化上的“贫血”所致，这个表面上合理的解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根文学的方向是指向中国传统文化，但使用的却是西方的现代性武器与信念。韩少功在宣言式的《文学的根》中这样说：“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现代观念”为何物？这正是寻根文学的问题所在。从中国近代史上看，1900年的义和团失败，标志着以坚决排除现代思想和现代技术的途径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了”；⁽⁶⁾之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给国人带来了“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世界观，西方的道路和西方的经验成为中国现代道路的仿效，中国开始了以先进的西方为参照为追赶对象的现代性。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时，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和西方的精神更成为文化先驱祭起的大旗，先驱们以审判传统文化的姿态，称欧洲为“庄严灿烂之欧洲”，而“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⁷⁾自此，西方现代性发生以后衍生的一系列价值理念，比如人道主义与人权、启蒙与理性、自由与民主等，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百年来想象现代中国的价值支撑，其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

判而使西方的启蒙现代性变成现代中国自身反思历史、改造现实、憧憬未来的思想视域与问题框架。这之间虽然有曲折反复和变动,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所执着追求的依然是五四先驱提出的“立人”理想,只不过这时是从康德那里找到了“主体性”,取道新康德主义直接奔向西方启蒙现代性;“个体生命”的现代意义更加突出地被放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中。传统除了依附于海外学者或新儒家而匆匆闪过之外,它与现代的正面关联并不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寻根作家大多是知青作家,他们的生活经验与遭遇文学“走向世界”时的种种问题,让他们认同于传统,向往在传统中发掘具有民族意味的思维方式、哲学底蕴、精神品格,开掘民族文化的现代资源,他们甚至以批判的姿态审视了当时被视为现代思想、新文学源头的“五四”新文化,把“五四”看成是与传统文化断裂、全盘西化的起点,持一种与五四先驱不同的肯定的态度回望传统。但作为知青作家,他们的知识背景和他们的成长经历,又使他们成为五四“立人”思想的继承人,有着排斥传统的集体潜意识,同样焦虑于“人的文学”的建立与“人的主体性”的掘进。这种矛盾状态,既体现在寻根作家对于传统的各自不同态度上,(如李杭育就说“有时我真万分痛恨我们的传统”,认为“中国文学的传统并不很好”。⁽⁸⁾)也表现在他们创作实际与理论倡导的背离。在很多情况下,当他们的叙事正面触及传统时,总会表现出一种对传统的犹豫、怀疑乃至批判,他们回望传统的所持“现代观念”并没有超越启蒙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创作仍然不由自主地与先驱一起站在启蒙现代性的价值起点和问题框架中。处于80年代中期的他们,并不可能在反思现代性的维度上来理解“现代观念”,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20世纪的西方现代性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更难于从学理的角度去反思这种危机正是启蒙现代性负面价值的充分展开,这实际上也暴露出寻根作家乃至当年文化热中弄潮儿想象中的现代性,实际上还是西方主义的。长期以来,中国的现代性想象都无法摆脱西方主义的启蒙现代性的思维模式,这种现代性的一元化思维模式限制了寻根作家对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双向思考,也无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真正探索出中西对话中的民族—国家主体形象,真正实现传统的现代意蕴转换。站在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价值起点

和问题框架中寻找中国文化传统,重建传统的尴尬便由此产生。当然,也正是这种尴尬,使得寻根文学具有了时代文学转型的标志意义,恰恰是寻根作家的那种犹豫和矛盾,才呈现出寻根文学自律审美的现代价值,这也是寻根文学不少作品至今让人难于忘怀的原因。

二

那么,为什么寻根作家寻找、重建传统的愿望要落入批判传统的圈套,会不由自主地回到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价值起点和问题框架中?这是重建传统尴尬的一个更大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想象一直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没能摆脱启蒙现代性这个“一元的”想象框架,所以也就无法超越传统与现代、中国(东方)与西方的对立思维模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东方)与西方,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最突出的问题,这种对立思维一直统摄着现代中国的想象,引发了20世纪多次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文化论争,并一刀劈开了文化的保守与进步、封闭与开放的界限。这种一元现代性的对立思维,造成了对中国现代性方案展开的历史误读以及对这种误读的历史抒写,从而影响了一百多年来国人的现代想象,屡次发生重建传统的困境。

事实上,在五四前后,以西方为标尺的启蒙现代性仅仅是当时中国现代性选择的一种方案。“五四”时期对“现代化”道路的设想起码有三股不小的力量:⁽⁹⁾一是以杜亚泉、梁启超、张君勱、《学衡》诸君、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二是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阵营;三是自由主义提供的中国“现代化”思路。文化保守主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主张以中国“固有文明”为准绳,贯穿西方文化的“散线”,达到“融汇东西”,以挽救传统资源失范的弊病,因此他们强调传统资源在现代化中的程序性和立体性。其思维方式是传统的“中体西用”模式,主张以中学去“同化”西学,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方案,而非有些研究者所说的反思现代性的一种方式。梁启超、张君勱等人确实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危机,并企图以传统文化来制衡西方文明的弊病,是刘小枫所称的一股“中国的审美主义思潮”;“它宣称回归内在性、维护一

切生存意趣的此岸性、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诗意化)、以艺术代替宗教、对生存持无差异的游戏式态度”但是它“以民族价值优位论对西方思想的批判代替了现代性批判”“未能真切地与审美主义论述中的现代性问题照面”,^[10]在现代性还没有生根发芽中国,这种既想“昌明国粹”,又想“融化新知”的思考,其致命点是未能跃出传统文化的限制,创造出适应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无法实现挽救民族危亡这个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所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现代方案必然被“救亡”的时代问题所淹没。新文化阵营反对儒家的以家庭为本位的纲常礼教传统,主张以西方文明改造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在传统文化反省的基础上,促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换。如胡适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提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就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化的环境,因此他有意识地反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理念与习俗,有意识地将男女个人从传统势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以赞扬生命和人类价值对抗压抑,陈独秀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来完成伦理的最后觉悟,重现晚周时期百家争鸣的自由局面,并且把启蒙工作看作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鲁迅则以“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用启蒙现代性来抗争封建专制对个性的压抑,反对儒家的“吃人礼教”,但对儒家以外的诸子以及魏晋时代的人格却有着理想的向往。自由主义提供的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思路则是在民族文化自省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积极的成果,实现“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提倡‘重新评估一切’的怀疑精神、否定专制的民主精神、破坏偶像崇拜的科学精神和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原则”。自由主义的倡导有的就发自新文化阵营内部,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与新文化阵营比较一致,却也存在着相互差异的文化立场和观察问题的方式。实际上,当时即使是新文化阵营同人,他们对待传统与现代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胡适与周作人都可以称作新文化阵营中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都是探讨新文学来源的名作,虽说写于不同的时期,讨论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但两部著作则体现出两人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的不同思考,前者将中国古文文学判为“死文学”或“半死文学”,认为白话新文学的出现是宣告了古文学的死亡,后者则将

新文学的源流追溯到明代的“公安派”,把新文学当作是中国文学“言志派”与“载道派”循环曲线上的历史表现。所以说五四前后的现代性方案,无论体现在思想文化论争上,还是在文学的想象中,都存在着多元状态和多元选择的可能性。这样的一些现代性方案,随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变动,此起彼伏,只是后来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现代性方案便朝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加上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权威政治定位,对五四前后所展开的多种现代性方案的叙述走向一元模式。这期间,中国现代性的叙述,要么在反封建、反传统的启蒙上想象,要么是在反帝、反西方的冲动中建构,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东方)与西方、启蒙与救亡的两极价值间进行选择。而无产阶级革命却凭借着自己的胜利,宣告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将社会主义叙述为现代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选择。这种二元对立的现代性逻辑在冷战格局形成后更为加剧,在东西方意识形态敌对状态中,东方与西方、阶级与人道是无可调和的对立。因此,作为对“文革”和“左”的政治路线的反拨,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再次将封建主义、孔孟之道作为批判对象,重新祭起以科学、民主、人道、理性为主旨的启蒙现代性旗帜。简要地梳理这一线索,主要是说明寻根作家并没有超越中国现代性历史叙述的框架,没有超越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个二元对立中的启蒙现代性逻辑。按寻根作家的阐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构冲动,是出自于“过多的横向借鉴西方文化会造成民族个性的消融”的焦虑,从80年代初的重新启蒙到80年代中期对民族自我的焦虑,实际上也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摆动的表现。这样的摆动,表明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对重建传统缺乏足够的信心。

三

寻根作家重建传统信心的缺乏,带来的是自己不敢直面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在寻根文学中,创作的笔触更多的是伸入蛮荒之地、乡村野渡,作家在一些文明极少涉猎到的空间展开民族千年文化的想象,作品在大量的民俗描写、民间传说、神话、古歌、仪式的表演中表现着远古的魅力,他们以

民间的叙事展示着中国民间奇特的文化风采,却没能正面表现传统文化主流的“根性”与现代性的联系。因此,寻根文学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是那些原始性的生命记忆,如莫言红高粱家族的血性、郑万隆的“老棒子”形象的古朴阳刚,倘若表现到传统文化主流的价值信念时,不是如《小鲍庄》那样在诗意中融入反讽的笔致,就是像《老井》一般以故事的喜剧结局透露出人性的悲哀。也只有怀疑人性的文学、反对用西方批判中国文化的阿城,才写出了寻根的经典之作《棋王》。

事实上,寻根作家开掘、重建传统的冲动,除了作家自身民间生活的经历、经验启示外,其灵感还来自于拉美文学的“爆炸”影响,是拉美文学在开掘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成功给了寻根作家重要的启发,是拉美文学的“爆炸”坚定了寻根作家对自己脚下文化岩层的开掘信心。寻根作家没有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这一本土历史资源的接受,一批直面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思想成果,也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对拉美作家获得西方世界认可这一结果的关注,远远胜过对传统与现代生活关系的思考。正如张清华在《历史神话的悖论和话语革命的开端——重评寻根文学思潮》一文中指出的:拉美文学作为一种“后殖民主义”文化现象,寻根文学对它的热衷以及企图重构民族文化的承诺背后,蕴涵了寻根作家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现象的倾慕与回应,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实质上立场是暧昧的。⁽¹⁾从这个角度看,这依然是西方的东方想象在制约着寻根作家的传统重建。在《文学的‘根’》这篇文章中,韩少功列举了诸多西方的史学家、思想家、作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赏,西方世界中这些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赞赏,是坚定寻根作家以及80年代中后期民族文化推崇者进行“寻根”的重要因素。那时无论是寻根作家,还是文化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还刚刚由思想解放的新启蒙的语境中走过来,在革命的现代性方案最终以“文革”那样的恶梦收场以后,西方的启蒙现代性在8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最有效的价值选择,也是寻根作家重构传统文化谱系的基本立场。在这样的语境中,寻根作家既意识到民族文化身份在全球文化综合中的保持民族自我的关键性,触及到“五四”“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而造成的“民族文化断裂”,又走不出“五四”以反传统为主题的现代启蒙框架,他们依然

对于传统文化的整体尤其是其主流的现代价值有所怀疑和担忧。他们认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¹²⁾他们所认知的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那些“不入正宗”的俚语、野史、传说、风俗、性爱方式,更多的存在于乡土、民间、胡同、里弄、四合院,民族文化作为现代性文化身份的表征,在他们的创作里便表现为散落于乡土民间的与文明相抗拒的文化火花,“规范”之内的传统主流在传统重建中失语,传统文化只能以文化个性的名义参与到民族自我形象重建的历史进程中。因此寻根文学的边缘化的地域文化、原始性的民间文化和未被现代文明侵扰改造后的乡土文化,最终是以“失落的文化”形象出现,表现出一种文化“挽歌”的格调。

以上三点,便是寻根文学重建传统文化价值支撑的尴尬所在。今天,中国已经具有了比80年代更自觉的现代化中国的中国身份意识,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实实在在的实际,是现代、前现代与后现代在中国的奇特遭遇,反思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进程也已经明确的提了出来,这也就为重建传统文化、在传统中寻找现代性的价值支撑提供了更现实更可能的语境。但无论如何,要真正在传统中赢得现代价值资源,就必须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内在逻辑,确立多元现代性观念和方案,在中国(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而不是对立中探索建设,这才能超越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在文化身份上实现全球化语境中的现代中国的真正的自我认同。

注释

- (1)王光明《“寻根文学”新论》,《文艺评论》2005年,第5期。
- (2)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 (3)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 (4)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
- (5)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 (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 (7)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
- (8)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
- (9)参照欧阳哲生的《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10)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 (11)张清华《历史神话的悖论和话语革命的开端——重评寻根文学思潮》,《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 (12)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